

赵汭《春秋》“策书之例”与“笔削之义”说论析

李 建

(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, 山东 曲阜 273165)

[摘 要] 在《春秋》学史上,元末《春秋》学家赵汭研治《春秋》的最大特点是以义例说经。他考论鲁史与《春秋》之别,明辨史“例”与经“义”之分,提出了系统的以“策书之例”与“笔削之义”为核心的《春秋》书法义例说。其《春秋》义例学说,是在依据《左传》及杜预注、融通三传史法经义说、批判继承诸家义例书法说基础上的发明,不仅体系颇为严密完整,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《春秋》诠释学系统。赵汭的《春秋》义例学所体现出的会通经史、据传求经,由《左传》到《春秋》、由考证史法而辨析经义的治经理路,以及力纠唐宋以来舍传求经、虚辞说经、附会穿凿之弊端的经学理念,是其《春秋》义例学说的主要价值和贡献。

[关键词] 赵汭 策书之例 笔削之义 《春秋》义例 史法经义

[中图分类号] K092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1002-5332(2015) 04-0031-10

赵汭(1319-1369),字子常,安徽休宁人,元末研治《春秋》学的代表人物。曾师事当时知名儒者黄泽,得其《周易》、《春秋》为学之要。赵汭为学博洽,兼通经史,于《春秋》工夫尤为精邃,有《春秋师说》、《春秋集传》、《春秋属辞》、《春秋左氏传补注》等著作行于世。赵汭研治《春秋》的最大特点是以义例说经。他认为,《春秋》乃孔子“经世之书”,研治《春秋》当“深知圣人制作之原”,^①而欲究圣人制作之原,当由《礼记·经解》所谓“春秋之教”以求“属辞比事”之法,然后“圣人经世之义可言”。^②因此,赵汭考论鲁史、《春秋》之别,明辨史法、经义之分,解析三传及诸家之得失,创发“策书之例”与“笔削之义”《春秋》书法义例说,从而形成了颇为完整系统的《春秋》义例学说体系,成为继西晋杜预、南宋陈傅良等《春秋》义例书法说之后,考索研说《春秋》义例最为详备、体系最为完善严密者。不仅如此,赵汭还以自创的《春秋》义例学说体系诠释《春秋》,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《春秋》诠释学系统。学界对赵汭及其《春秋》学之研究,尤其是作为其《春秋》学核心的义例学说的研究还相对薄弱,本文拟从赵汭的史法经义观、“策书之例”与“笔削之义”说以及赵汭《春秋》义例学说的特点及评价等方面,试对其《春秋》义例学说作一梳理论析,以冀有补于相关研究,并敬请方家指正。

[收稿日期] 2015-08-24

[作者简介] 李建,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、孔子与山东文化强省战略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,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思想史。

① 赵汭《春秋集传序》,《春秋集传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1988年版。

② 赵汭《春秋属辞自序》,《春秋属辞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1988年版。

一、治《春秋》当分别史“例”与经“义”

以“属辞比事”为基点,区分“经”“史”,辨别“义”“例”^①,通过明晰“策书之例”以求“笔削之义”,是赵汭探究《春秋》义例并以之解说《春秋》的立足点和出发点。自三传以来,解说《春秋》者可谓纷然杂陈,歧义多变,这种情况尽管是由于今文古文、汉学宋学各自旨趣不同所致,但也与各家未能穷本究源、明辨《春秋》自身性质及孔子作《春秋》本原有关。而这一切其恰恰成为赵汭立足《春秋》“属辞比事”,区分鲁史与《春秋》,辨别史法与经义,深究圣人制作之本原的出发点。

赵汭认为,孔子笔削鲁史制作经世之书《春秋》,惟有孟子深知其制作本原。孟子说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,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……其事则齐桓、晋文,其文则史。孔子曰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’”^②即为“孔门传《春秋》学者之微言”^③。但自孟氏之后,多未能推明孟子“事文义”之说以解《春秋》,因而互有得失,此自《左氏》《公羊》《谷梁》三传已开其端:

《左氏》有见于史,其所发皆史例也,故常主史以释经,是不知笔削之有义也;《公羊》《谷梁》有见于经,其所传者,犹有经之佚义焉,故据经以生义,是不知“其文则史”也。后世学者,三传则无所师承,故主《左氏》则非《公》《谷》,主《公》《谷》则非《左氏》,二者莫能相一。其有兼取三传者,则臆决无据,流通失中。其厌于寻绎者,则欲尽舍三传,直究遗经,分异乖离,莫知统纪。使圣人经世之道暗而不明、郁而不发,则其来久矣。^④

依赵汭之见,诸家之失在于,一是三传(实为两家)各执经、史或事、义之一端,不知区分“史例”史法与“笔削之义”,虽各有所得,亦不免各有所失。二是后世治《春秋》者,亦未能明辨三传之得失长短,或拘于偏见,互相排斥;或取舍三传,而不得要领;或舍传求经,各立异说,更不知义法纲纪。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,即在于自三传始,便“不考于孟氏,而昧夫制作之原”,未能区分“经”“史”,辨别“义”“例”^⑤。

那么,赵汭为何主张研治《春秋》要有这种辨别区分呢?这一方面是受其老师黄泽学说的启发影响,另一方面则是其积思自悟的结果。宋濂在《春秋属辞序》中说:“(黄泽)尝语于子常(赵汭)曰‘有鲁史之《春秋》,则自伯禽至于顷公是已;有孔子之《春秋》,则起隐公元年至于哀公十四年是已。必先考史法,然后圣人之笔削可得而求矣。’子常受其说以归,昼夜以思,忽有所得,稽之《左传》杜注,备见鲁史旧法,粲然可举。亟往质诸先生,而先生歿已久矣。子常益竭精毕虑,几废寝食,如是者二十年,一旦豁然有所悟入,且谓《春秋》之法,在乎属辞比事而已。”赵汭自己也说“始汭闻诸师曰‘《春秋》本鲁史成书,故必先考史法,而后圣人之法可求。’”^⑥“汭自早岁获闻资中黄楚望(黄泽)先生论五经旨要,于《春秋》以求书法为先,谓有鲁史书法,有圣人书法,而妙在学者自思而得之,乃为善也。于是思之者十有余载,卒有得于孟氏之言。”^⑦也就是说,赵汭首先秉承师说,认为《春秋》一名,实有鲁史《春秋》与孔子《春秋》之不同,二者各有书法,即“鲁史书法”与“圣人书法”之别,所以,欲考求孔子据鲁史成书的《春秋》笔削义旨,当先从鲁史《春秋》的史法、书法入手。其次,赵汭又通过深悟孟子关于《春秋》“事文义”的论说,以及《礼记·经解》关于“属辞比事”为“《春秋》之教”的阐释,从而得出了研治《春秋》之义、理解笔削之旨的关键在于推究“属辞比事”法

① 赵汭所言之“经”,指孔子笔削之《春秋》;所言之“史”,为未经孔子笔削之鲁史《春秋》,即所谓“策书”。与之相对应,其所谓“例”,即“史例”、“策书之例”;所谓“义”,即“经义”、“笔削之义”。

② 《孟子·离娄下》,新编诸子集成本。

③ 赵汭《春秋集传序》。

④ 赵汭《春秋集传序》。

⑤ 宋濂在《春秋属辞序》中论及《春秋》学说流变时也说“濂颇观简策,所载说《春秋》者多至数十百家,求其大概,凡五变焉。……五变之纷扰不定者,盖无他焉,由不知经文、史法之殊,此其说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欤!”

⑥ 赵汭《春秋属辞目录》。

⑦ 赵汭《春秋集传序》。

的认识。赵汭在《春秋纂述大意》中说“尝谓圣人作经,虽不可测,以今观之,二百四十二年,简重如山,亦必属辞比事而后施笔削。所以学《春秋》者,若非属辞比事,亦不能达笔削之权。故其间纪纲义例,皆是以此法求之。”^①在《春秋属辞目录》中亦说“窃思伦类区别,为义至精,参互错综,易相矛盾,苟不属辞比事以通之,岂无遗憾。”所以他强调“‘属辞比事’而不乱者,深于《春秋》者也”,“学者由《春秋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,制作之原既得,而后圣人经世之义可言矣”^②。而《春秋》“属辞比事”与史官“策书之例”密切相关,所以他又说“故学者必知策书之例,然后笔削之义可求,笔削之义既明,则凡以虚辞说经者,其刻深辩急之说皆不攻而自破。苟知虚辞说经之无益,而刻深辩急果不足以论圣人也,然后《春秋》经世之道可得而明矣。”^③

赵汭不仅明确分疏了鲁史与《春秋》、“鲁史书法”与“圣人书法”之别,而且提出了以“属辞比事”为基点,通过明辨“策书之例”以探求“笔削之义”的治《春秋》学方法,并且进而形成了系统的以“策书之例”与“笔削之义”为核心的《春秋》义例学说,这是他研治《春秋》学的创获,足可成一家之言。换言之,赵汭以史法推明书法、以书法究明义法经义,从而最终揭示孔子《春秋》经世之大义的治经理路,与那些或泥于史法之例而不知求经义,或偏于求经义而混淆史法经法者,有着截然不同。由此亦可说,赵汭这种以“义”“例”治《春秋》的理念,是在三传及诸家关于《春秋》书法说基础之上的进一步深化和超越。

二、“策书之例”与“笔削之义”及其关系

赵汭在其《春秋集传》书序中归纳了十五条“策书之例”^④,即史官及鲁史《春秋》的史例、史法:

一曰君举必书,非君命不书;二曰公即位,不行其礼,不书;三曰纳币、逆夫人、夫人至、夫人归,皆书之;四曰君夫人薨,不成丧,不书葬,不用夫人礼,则书卒,君见弑,则讳而书薨;五曰適子生,则书之,公子大夫在位,书卒;六曰公女嫁为诸侯夫人、纳币、来逆、女归、娣归、来媵、致女、卒葬来归,皆书,为大夫妻书来逆而已;七曰时祀、时田,苟过时越礼则书之,军赋改作逾制亦书于策。此史事之录乎内者也。八曰诸侯有命告则书,崩卒不赴则不书,祸福不告亦不书,虽及灭国,灭不告败,胜不告克,不书于策;九曰虽伯主之役令,不及鲁,亦不书;十曰凡诸侯之女行,惟王后书,适诸侯虽告不书;十一曰诸侯之大夫奔,有玉帛之使则告,告则书。此史氏之录乎外者也。十二曰凡天子之命无不书,王臣有事为诸侯,则以内辞书之;十三曰大夫已命,书名氏,未命,书名,微者,名氏不书,书其事而已,外微者,书人;十四曰将尊师少称将,将卑师众称师,将尊师众称某帅师,君将不言帅师;十五曰凡天灾物异无不书,外灾告则书之。此史氏之通录乎内外者也。

赵汭将此十五条“策书之例”按照“内外”之别分为三大类:第一至第七条是史官记录各自国内大事的书例,第八至第十一条是史官记录本国之外其他诸侯国大事的书例,第十二至第十五条是史官记录国内外大事都需要遵循的书例。赵汭认为,这十五条“策书之例”,也是自鲁公伯禽以来鲁国史官遵循“周公遗法”而记录历史大事的史例(体例)、史法,是鲁国《春秋》正史的“策书常法”,即鲁国史官一贯遵循、一脉相承的原有记事规则。也就是说,在鲁国正史中,什么可以“书”,什么可以“不书”,以及如何“书”或“不书”等,原本有着一套固定的史法规范或书法原则,赵汭有时又将其称之为“史策成言”、“古史遗法”、“国史定法”、“史氏恒辞(法)”、“鲁史遗法”等。实质上,赵汭所谓的“策书之例”等,即是指史官、鲁史的书法或史法。

① 赵汭《东山存稿》卷3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1988年版。

② 赵汭《春秋属辞自序》。

③ 赵汭《春秋集传序》。

④ 赵汭《东山存稿》卷三亦存《春秋集传序》一篇,文字与其《春秋集传》书序略异。其中归纳“策书之例”十四条,无第七条。

而孔子据鲁史作《春秋》，对此“策书常法”有依从因循，有损益变革，即有“有笔有削”或“有笔无削”等“笔削”之义法（“笔削之义”）。赵汭将其归纳为八条：一曰存策书之大体；二曰假笔削以行权；三曰变文以示义；四曰辨名实之际；五曰谨中外（华夷）之辨；六曰特笔以正名；七曰因日月以明类；八曰辞从主人。^①他并且强调，这八条“笔削之义”，“实制作之权衡也”^②，即是说，这就是孔子根据鲁史史法（书法）作《春秋》的主要标准与原则，它体现了孔子作《春秋》之用意；而通过对这些书法标准与原则的揭示，《春秋》中蕴含的经世之道和圣人寄寓之义即可显现出来。^③以下分别予以概要分析说明。

（一）存策书之大体

“存策书之大体”，意谓孔子遵从鲁国国史“策书之例”，对国史旧文“有笔无削”，以保存、体现原有史官书法的“一国纪刚本末”之“实”，如“策书大体”所包含的“公即位、逆夫人、朝聘、会同、崩薨、卒葬、祸福、告命、雩社、禘尝、搜狩、城筑、非礼、不时，与夫灾异、庆祥之感”等事例，皆据鲁史“策书常法”笔录“史之旧文”于《春秋》，有笔而无削，“使不失鲁国正史之常”。这主要是从史官常法（史例、史法）、纪事内容等角度说明作为经书的《春秋》的特点，即通过对“策书大体”的保存，一定程度上保持鲁国国史常貌。“夫子作《春秋》，有笔焉，有削焉，策书之大体，义有无待于笔削者，吾无加损焉。”^④之所以如此，按赵汭之见，是因为西周未乱之时，鲁国国史本已体现周公遗法，国之纲纪、善恶寓含其中，“不待笔削而义已明”，所以只须如实照录鲁史旧文以存其实即可。另外，赵汭也提到，孔子所作《春秋》乃“当代之史也，使仲尼笔削之际，不复存其大体，鲁之君臣能无骇乎？”^⑤意谓孔子《春秋》通过对鲁史大体的保存，或可避免因写当代史而遭当政者猜忌之险。由该条“存策书之大体”亦可看出，虽然孔子对体现鲁史“大体”的史之旧文皆笔而不削，表面看似依然在贯彻其所谓“述而不作”之原则，但究其实，孔子作《春秋》的出发点毕竟与鲁国史官不同，他并非照录旧史以恢复或保存鲁史原貌为鹄的，而是在不改鲁史基本面貌（形式）的前提下寄寓自己的思想理念。所以，史官所作鲁史与孔子所作《春秋》，史官策书之“义”（史义）与孔子笔削制作之“旨”（经义），在视角、归趋或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，一为史官之史及史法，一为圣人之经及义法。孔子所笔而不削的内容，只不过是其所认同的符合其制作理念的鲁史中体现纲纪、善恶之“义”的部分而已。

（二）假笔削以行权

“假笔削以行权”，意谓孔子为拨乱经世而制作的《春秋》，不全依鲁史史法旧文，而是有书有不书，“其所书者则笔之，不书者则削之”^⑥，以体现《春秋》制作（书法）之义的权变。“书”与“不书”即“笔”“削”。所以赵汭说“是故有笔有削以行其权，有笔无削以存其实，实存而权益达，权达而实愈明，相错以畅其文，相易以成其义者也。”^⑦之所以“假笔削以行权”，是因为西周自平王东迁以来，王室衰微，诸侯背叛，霸业不兴，外裔横行，大夫专政，陪臣擅命，“伐国、灭国、围入、迁取之祸交作，弑君、杀大夫、奔放、纳入之变相寻”，而史官及鲁史的“策书常法”已不足以反映这些“善恶之情”，

① 赵汭《东山存稿》卷三《春秋集传序》一文曾将“笔削之义”归纳为十条：“一曰存策书之大体，二曰常事不书，三曰举重，四曰谨名分之辨，五曰辨名实之际，六曰谨夷夏之辨，七曰详盛衰之变，八曰辞从主人，九曰无达例，十曰议而不辞。”对比二者内容及其所著《春秋集传》与《春秋属辞》两书的先后关系，《东山存稿》中《传序》“笔削十义”之文当为初稿。

② 赵汭《春秋集传序》。

③ 赵汭所谓“笔削之义”的“义”，也即孔子所说“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”，以及孟子所说“事文义”之“义”。但赵汭在论说“笔削之义”时，“义”实际上兼有《春秋》书法之“义例”与孔子所寓之“义”两层含义。

④ 赵汭《春秋集传》卷1。

⑤ 赵汭《春秋属辞》卷1，“存策书之大体第一”。

⑥ 赵汭《春秋属辞》卷8，“假笔削以行权第二”。

⑦ 赵汭《春秋属辞》卷1，“存策书之大体第一”。

所以孔子作《春秋》“断自隐公，有笔有削，以寓其拨乱之志”^①，通过“有书有不书，以互显其义”^②。换言之，对于史官的“策书常法”（史法之“恒体”、“定体”）及鲁史《春秋》的旧文，孔子既有“存策书之大体”的“有笔无削”的因循实录，更有寄托其经世之志的“有笔有削”的损益变革，如此才能更完整地体现孔子及《春秋》所寓之义。可见，“笔削”是区别“策书”史法与《春秋》经法、理解圣人制作之义旨的关键。

那么，《春秋》是如何“笔削”的呢？赵汴将《春秋》“笔削”之法归纳为三种方式：一曰不书，二曰变文，三曰特笔。“变文”与“特笔”另寓“笔削之义”，即第三至第六条，故赵汴“假笔削以行权”的“笔削”特指第一种“不书”（即“削”）的情况，正与第一条“存策书之大体”的“有笔无削”相对应。赵汴认为，《春秋》“不书之法”或“不书之义”又有五种方式及寓意：一曰略同以存异，二曰略常以明变，三曰略彼以见此，四曰略是以著非，五曰略轻以明重。^③即通过“不书”（“削”、“略”）来变通“策书之例”（史法、常法），达到“存异”、“明变”、“见此”、“著非”、“明重”的目的，从而显示孔子《春秋》之义。例如，国史史法“公如大国恒书‘至’”、“公会盟主恒书‘至’”，而孔子有时可能削而不书“至”予以变通，所谓“国史有恒体，无辞可以寄文，于是有书有不书，以互显其义”^④。另外，按赵汴之意，书与不书，同时要根据史法的具体情况和孔子所要表达的义来决定，如所谓“以书‘至’为恒，则不书‘至’以见义，以不书‘至’为恒，则书‘至’以见义，所谓略同以显异是也”^⑤。

（三）变文以示义、辨名实之际、谨中外之辨

“变文以示义”，“辨名实之际”，“谨中外之辨”^⑥三条，即上文所说“笔削”的第二种方式“变文”的情况。与“笔削”的“书”与“不书”不同，所谓“变文”，即对于鲁史“文同而事异”或“事同而文异”的情况，孔子通过变换个别文词以表达不同的喻义，使学者即其异同详略来明辨是非、决断嫌疑。此类“变文”，赵汴多指孔子《春秋》中名号、称呼、避讳等文词变化的情况。如孔子《春秋》记周王事，有时书“王”，有时书“天子”、“天王”，是因为“文同礼失，王不称‘天’”；记鲁公事，有时不书“公”，有时以他词代，是因为“讳公与王卿士盟，不书‘公’，同微者”，“讳公为仇人役，变‘公’为‘师’”；^⑦同是大夫逃奔他国，有的书官职，有的书其字，而不书其名，是因为“大夫奔，非君出之（驱逐），不名”，等等。至于“侵”“伐”等文词的变文使用，赵汴认为，“《春秋》所书侵伐，除伯者伐叛讨贰之外，莫非为乱而已。皆从其恒辞，则无以示义，皆变其文，则无以见实。故夫子于内，师加小国，虽微者言伐，见其恃众凌寡，加大国，虽公将言侵，见犯非其分，悉变其文以示义。于外，师或以大加小而言侵，或以外裔干中国而言伐，或小国而言伐我，或大国而言侵我，皆从其恒辞以见实。《周官·大司马》：‘比小事大，以和邦国，九伐之法，冯弱犯寡则眚之。’此《春秋》内师书侵伐之义也。”^⑧即通过变换“侵”“伐”等文词的使用，既显示当时诸侯相互攻战杀伐的实情，也体现《春秋》所表达的是非嫌疑之义。

而“辨名实”、“谨中外”可以说是“变文以示义”的进一步具体展现。赵汴认为，“辨名实”是孔子《春秋》之“要义”，“正必书王，诸侯称爵，大夫称名氏，四夷大者称子，此《春秋》之名也。诸侯不王而伯者兴，中国无伯而夷狄横，大夫专兵而诸侯散，此《春秋》之实也。夫《春秋》之名实如此，将以示后世，曰实录可乎？曰实录且犹不可，而况于圣人拨乱以经世之事哉！此辨名实所以为《春

① 赵汴《春秋属辞》卷1，“存策书之大体第一”。

② 赵汴《春秋集传序》。

③ 赵汴《春秋属辞》卷8，“假笔削以行权第二”。

④ 赵汴《春秋集传序》。

⑤ 赵汴《春秋属辞》卷8，“假笔削以行权第二”。

⑥ “中外之辨”，赵汴在《春秋属辞》等书中有时用“内外之辨”、“华夷之辨”或“夷夏之辨”，其义相同。

⑦ 如《春秋》僖公二十九年“夏六月，会王人、晋人、宋人、齐人、陈人、蔡人、秦人盟于翟泉。”庄公八年“春，师次于郎，以俟陈人、蔡人。……夏，师及齐师围郕……秋，师还。”见赵汴《春秋属辞》卷十，“变文以示义第三”。

⑧ 赵汴《春秋属辞》卷10，“变文以示义第三”。

秋》之要义也。”^①所以,他认为,孔子《春秋》“辨名实”的书法有二:一是“去名以全实”,即“征伐在诸侯,则大夫将不称名氏,中国有伯,则楚君侵伐不称君”;二是“去名以责实”,即“诸侯无王,则正不书王,中国无伯,则诸侯不序,君大夫将,略其恒辞,则称人”。也就是说,孔子通过改变旧史中关于“名称”的“恒辞”书法,以达到既反映历史事实(实录)又体现是非大义的目的。同样,“谨中外”亦是如此。赵汭所说的“谨中外”(“内外”“华夷”等),主要是指《春秋》对于楚、吴、越等所谓“夷”、“外裔”之国的书法与中国(华夏)“异辞”,这方面也主要体现在对楚、吴等外夷的君臣将帅等名称用词的变化上。之所以如此,赵汭认为,这正体现了孔子“信(申)大义于天下”的经世理念。例如,“楚既僭王,则周之叛臣也,吞灭诸夏,则中国之贼也,故《春秋》当中国有伯,则楚君、大夫、将皆称‘人’,明中国之大义,以信桓文之志也”^②。按赵汭之见,尽管《春秋》书法“谨内外之辨”,如“书楚事与中国异辞”,但仍体现了孔子存事实、示大义的特点。例如,《春秋》记楚王事,有时书“楚人”,有时书“楚子”,是因为“经于将兵称人,既变文以示义,则盟会从其恒称,以见实也”^③。

(四) 特笔以正名

由赵汭对“笔削”的“不书”、“变文”两种方式的论说可以看出,无论是“书”与“不书”,还是通过“变文”来“示义”、“辨名实”、“谨中外”,其意都是指孔子依循史官常法及鲁史旧文,对原有的常规文辞(“恒辞”“恒称”)斟酌损益或稍作变通以寓意而言,所谓“皆从史氏旧文”。那么,孔子作《春秋》是否有打破这种常规史法、常用文辞的情况呢?对此,赵汭是肯定的,这就是其所谓的“特笔以正名”:

特笔者,所以正名分、决嫌疑也。笔削不足以尽义,然后有变文;若夫乱久祸极,大分不明,而又有非常之故焉,则变文亦不足以尽义,是故有特笔。凡特笔,皆谓有所是正者也。夫变文虽曰有损益,然犹史氏恒辞尔;至于有所是正,则非复恒辞矣。卫君辄待孔子而为政,子曰“必也正名乎”,而又推极名不正之害,至于使民无所措手足。此经世之先务也。春秋世变极矣,父子君臣之间,人所难言者多矣,岂史氏恒辞所能尽其分哉!今考《春秋》,凡辞旨卓异与史文弗类者,皆人事之变,恒辞不足以尽义,而后圣人特笔是正之,非史氏所及也。然所是正者,不过片言,而三纲五常赫然复正。故曰:非圣人其孰能修之。庄周氏曰“春秋以道名分”,盖亦得其大意云。^④

即是说,对于“笔削”、“变文”亦不足以表达其义的“名分”等大是大非问题,孔子突破鲁史旧文的“史氏恒辞”或“史策成言”、“国史定法”,用不同于鲁史旧文的语言文辞进行表述,即通过“特笔”的方式以表达正名、经世的用意。如鲁僖公二十八年(前632年)冬,晋文公召周襄王参加诸侯会盟,《春秋》书曰“天王狩于河阳”,赵汭认为,此即孔子不同于诸如“天王会诸侯于河阳”等“史氏恒辞”的“特笔”书法,因为,如果按照旧史书法记为“王会诸侯”之类的常规表述,则上下失序、下陵上替、纲纪废坠、王道不尊的名分实际无以纠正,而孔子“改正之,曰‘天王狩于河阳’”,则天威赫然临于下土,有不可以强弱论者,而晋侯盖世之功微矣。上以尊天子,下以全晋侯,而贵王贱伯之意溢于辞表”^⑤。可见,“特笔”也是“变文”的一种特殊形式。但赵汭同时认为,这种很能反映孔子纠正名分嫌疑的“特笔”书法,孔子使用并不多,“特笔亦不过数简”、“不过片言”而已,这是因为,“《春秋》本鲁史成书,夫子作经,唯以笔削见义,自非有所是正,皆从史氏旧文,而所是正亦不多见”^⑥。而这也正是赵汭在其“笔削之义”第八条“辞从主人”中要进一步说明的意思。

① 赵汭《春秋属辞》卷11,“辨名实之际第四”。

② 赵汭《春秋属辞》卷12,“谨内外之辨第五”。

③ 赵汭《春秋属辞》卷12,“谨内外之辨第五”。

④ 赵汭《春秋属辞》卷13,“特笔以正名第六”。

⑤ 赵汭《春秋属辞》卷13,“特笔以正名第六”。

⑥ 赵汭《春秋集传序》。

(五) 辞从主人

所谓“辞从主人”，是赵汭借用南宋陈傅良之语^①。此处的“主人”指“鲁君”，赵汭的意思是，孔子根据鲁史作《春秋》，除了在极个别的特殊情况下使用自己的言辞“特笔”书写外，其他所有文字皆来自鲁史旧文，只不过孔子有所笔削而已。赵汭将“辞从主人”作为《春秋》“笔削之义”的一条，可以说有两点主要原因：第一，通过该条进一步体现《春秋》“笔削之义”的第一条“存策书之大体”，因为“存策书之大体”主要是从国史常法（史例、史法）、纪事内容范围等角度说明《春秋》经的特点，而“辞从主人”则是从鲁史史文、语言文辞的角度体现《春秋》经的特征，后者可以补充前者。第二，通过该条可以进一步说明鲁史与《春秋》、史法与经法的关系，辨别三传及后世说《春秋》者之得失。对于《春秋》经的言辞文字，尽管三传及其他说《春秋》者有“从史文”等说法，但均没有从经史之别角度予以辨析，所以使得“何者为史策旧文，何者是圣人之笔削”，暗昧难通，即使赵汭所推崇的“得学《春秋》之要，在三传后卓然名家”的南宋陈傅良亦是如此。因此，赵汭说“《谷梁》以国地之异名者，谓之‘从史文’，不能通诸全经。《左氏》所发多史例也，而记韩宣子之言，谓之《周礼》，且曰‘非圣人莫能修之’，则其失在不知有笔有削而已。至永嘉陈氏，乃专主笔削求经，然犹以爵号名氏为褒贬，误指《左氏》所录即鲁史旧文，而经之成言皆为圣笔所修，其所谓‘从主人之辞’者，亦无几焉。……故今特取陈氏语名篇，以矫其失。”^②

(六) 因日月以明类

赵汭认为，通过笔削（含有笔无削）、变文、特笔等义例书法方式，《春秋》的“上下内外之无别，天道人事之反常”，或者说“上下内外之殊分，轻重浅深之弗齐”之义还不能完全呈现，因为完全依照“以事系日、以事系月、以事系时”等史官纪事常法，春秋以来王室衰微、礼崩乐坏、世事变乱等是非得失仍会混淆不明。因此，孔子又以“日月之法”予以区别，此即所谓“因日月以明类”。赵汭说：

盖孔子之修《春秋》也，凡策书之大体既以实录而存，其王伯之会、中外之交、父子君臣之间，皆有笔有削以彰其义。至于上下内外之无别，天道人事之反常，史之所书或文同而事异，或事同而文异者，则皆假日月以明其变、决其疑。大抵以日为详者，则以不日为略；以月为详者，则以不月为略；其以日为恒者，以不日为变，以不日为恒者，以日为变，甚则以不月为异；其以月为恒者，以不月为变，以不月为恒者，以月为变，甚则以日为异。将使学者属其辞、比其事以求之，则事之存乎笔削者，既各以类明，而日月之法，又相为经纬，以显其文、成其义。^③

也就是说，孔子《春秋》书法，除有笔无削和有笔有削的方式外，还根据纪事的实际情况，通过对“日月”的书与不书以及相应的变通，来具体而微地呈现所记“上下内外、天道人事”的“恒（常）”、“变”、“异”等等，以便更好地彰显孔子所欲寄之义。当然，本条对“日月”的书与不书，与上文提到的“笔削”“变文”中的“书”与“不书”之义有交叠重合处。赵汭之所以将孔子“日月”书法特别地独立出来，其意当在进一步辨明经史之别，突显《春秋》“善恶浅深，奇变极乱”之微，并且与笔削、变文、特笔之法相为经纬，使之所体现的义类更加明晰，从而进一步“显其文、成其义”。

综上，赵汭所论列的《春秋》“笔削之义”八条义法，可分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：第一，“存策书之大体”与“辞从主人”为一层次，是孔子依循史官书法与鲁史旧文，笔而不削、实录以存其“实”的部分；第二，“假笔削以行权”与“变文以示义”、“辨名实之际”、“谨中外之辨”、“特笔以正名”为一层次，其中“假笔削以行权”又为后四者之统领，后四者又逐次递进，是孔子变通史官书法及鲁史旧文，有笔有削、变文（含特笔）以示其“义”的部分；第三，“因日月以明类”为另一层次，因为孔子的“日月”书法既有因循实录，也有变通笔削，所以可以通贯全经，使《春秋》隐微之义尽显。总而言之

① 陈傅良《春秋后传》卷二“凡《春秋》辞从主人，皆实录而已，非修《春秋》之辞也。”

② 赵汭《春秋属辞》卷15“辞从主人第八”。

③ 赵汭《春秋属辞》卷14“因日月以明类第七”。

之,这三个层面、八条义法既有相对的各自独立性,更有内在的相互交融贯通。正如赵汭在其《春秋属辞》篇目后记中所言“第一篇有笔无削与第二篇有笔有削者相对,第三篇至第六篇皆变文,与第八篇从史文者相对,而与前二篇相为经纬,其第七篇则又一经之权衡也。”^①而且,如前所述,赵汭认为《春秋》笔削义法,即体现在“属辞比事”中,因此,他归纳梳理的这八条“笔削之义”,正是通过推究《春秋》“属辞比事”而来,“其入处只是属辞比事法,无一义出于杜撰”^②。由此,赵汭形成了其完整的《春秋》义例学说体系。

三、赵汭《春秋》义例说的特点及评价

赵汭的“策书之例”与“笔削之义”说,浑然一体,适足构成了其独特、完整而严密的《春秋》义例学理论体系。从形式上看,赵汭所概括的十五条“策书之例”,是鲁国《春秋》的国史体例,即“鲁史书法”;所论列的八条“笔削之义”,是孔子的“圣人书法”,体现了孔子《春秋》书法所寓之义。但从其实际内容看,二者相互关联,密不可分,明确史法“策书之例”恰恰是推究经法“笔削之义”的依据和前提,而孔子《春秋》的“笔削之义”也只有通过明辨国史的“策书之例”才能最终得以揭示,所以说“学者必知策书之例,然后笔削之义可求,笔削之义既明……然后《春秋》经世之道可得而明矣”^③。同时,不仅“笔削之义”体现孔子所寓之义,反映史官书法的国史“策书之例”也同样可以体现孔子之义,即是说,“策书之例”也寓含着国史书法之史义,这个史义就是西周以来史官一贯遵循的“周公遗法”^④,即反映周公制作典章礼制的“义”。孔子既然志在拨乱反正,恢复“周公之法”,那么所作《春秋》就不必对符合周公之制的史官常法及鲁史旧文进行笔削,即便是“存策书之大体”,述而不作,也仍能寄寓孔子之义,只不过是借史官之义来表达己意而已。这也是孔子作《春秋》为何有因循实录、笔而不削,也有损益变通、有笔有削的原因所在。由此亦可以看出,赵汭论列“策书之例”与“笔削之义”,不仅仅在于区分史法、经法之别,更在于通过辨析梳理史法、经法以揭示其内在关联,从而真正体现孔子《春秋》之义。

从另一角度来看,赵汭以“策书之例”与“笔削之义”为核心的《春秋》义例学说体系,更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意义,即,既可以洞见《春秋》学诸家治经之得失,又可以具体而微地深辨《春秋》学自身诸问题。如前所述,自三传以来,经家学者蔽于一端,或如《左传》“以史法为经文之书法”,或如《公羊》《谷梁》“虽详于经义,而亦不知有史例之当言”;其后学者,即使如深究史例的杜预、融合三传书法以求经义的陈傅良,也不能避免其弊端,诸家纷扰不定,其主要原因即在于“不知经文、史法之殊”^⑤。赵汭以明辨史法、经法的“策书之例”与“笔削之义”立说,正可以明见诸家得失。更具体一步讲,虽然自孟子以来,对于孔子依据鲁史作《春秋》,有所谓“其文则史”、“皆因旧史”^⑥、“皆依旧文”^⑦等说,但《春秋》经中究竟哪些是孔子因鲁史旧文,有笔无削、述而不作的,哪些是孔子损益笔削、有述有作的,以及孔子是如何因循、制作的,其述作多寡、轻重程度又如何,等等,经家学者多因没有自己完善的义例说而不能予以系统辨明,且不免支离破碎,穿凿驳杂。而赵汭自成体系的分列史法“策书之例”与经法“笔削之义”的义例说,正可以分门别类、条分缕析地排比区分鲁史旧文与笔削制作,使之各有归属,体统分明,繁而不乱,从而也使得《春秋》的“属辞比事,莫不灿然,各有条

① 赵汭《春秋属辞目录》。

② 赵汭《东山存稿》卷3《答赵伯友书》。

③ 赵汭《春秋集传序》。

④ 赵汭《春秋集传序》:“古者列国皆有史官,掌记一国之事。《春秋》,鲁史策书也,事之得书不得书,有周公遗法焉。”

⑤ 宋濂《春秋属辞序》,载《春秋属辞》。

⑥ 如杜预《春秋释例》卷十五“皆因旧史之策书”,黄震《黄氏日抄》卷六十一“皆因旧史而修之”,萧楚《春秋辨异》卷一“皆因旧史之文”,程端学《程氏春秋或问》卷七“书之,不书之,仲尼皆因鲁史之文也”等。

⑦ 如宋魏了翁《春秋左传要义》卷八“仲尼书经,不以日月褒贬,或略或详,非此所急,故日月详略,皆依旧文……故因史成文耳。”

理”,正如宋濂所评价“何者为史策旧文,何者是圣人之笔削,悉有所附丽;凡暗昧难通,历数百年而弗决者,亦皆迎刃而解矣。……世之说《春秋》者,至是亦可以定矣!”^①也就是说,赵汭以其所构建的《春秋》义例学说重新审视和诠释《春秋》经传的“属辞比事”以及《春秋》“事”“文”“义”之关系,由此也建立起自成其说的《春秋》诠释学系统。这正是赵汭《春秋》义例学说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超越前人之处。

赵汭的《春秋》义例学说,是在依据《左传》及杜预注、融通三传史法经义说、批判继承诸家义例书法说基础上的发明。赵汭的老师黄泽曾论说研治《春秋》学要领“学《春秋》只当以三传为主,而于三传之中,又当据左氏事实以求圣人旨意之所归,盖于其中自有脉络可寻。”“说《春秋》当据左氏事实,而兼采公、谷大义。此最为简要。杜元凯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,此于《春秋》最为有功。”“学《春秋》以考据《左传》国史事实为主,然后可求书法。能考据事实,而不得书法者亦尚有之,未有不考据事实而能得书法者也。”^②赵汭治《春秋》,受其师黄泽影响,亦主张从《左传》入手,据事实以求经旨义理“夫得其事、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,未有不得其事、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也。故三传得失虽殊,而学《春秋》者必自左氏”^③。但如前所述,《左传》详于史事,然失于以史法为经法,杜预注释又延续其弊《公》《谷》二传详于经义,然失于不知“其文则史”及史例;陈傅良虽融会三传书法以考证笔削之义,然不曾知史法与经法之别。赵汭正是在此认识理念下,具体践行其师黄泽之教,以《左传》及杜预《春秋释例》为依托,吸取唐宋以来诸家尤其是陈傅良《春秋后传》义例说之长,而弃其所短,“有未及者,辨而补之”^④,由此构建起其融通三传及诸家史法、经义,“触类贯通,自成义例,与先儒所纂所释者殊不同”^⑤的《春秋》义例学体系。^⑥赵汭对其创获甚为自得,曾言“苦思之功,若有神助,圣人复起,不易吾言”^⑦。

赵汭的《春秋》义例学说虽然融会贯通,体例精密,但并非没有可议之处。如清人皮锡瑞评论:“赵氏分别策书、笔削,语多近是。《春秋属辞》,本此立说。孔广森深取其书。惟其书学非专门,仍有未尽是者。如‘隐公不书即位以成公意’,‘桓公书即位以如其意’,‘公薨以不地见弑’,‘公夫人出奔曰孙’,凡此等皆《春秋》特笔,未必鲁史有此书法。赵氏以为存策书之大体,是犹惑于杜预之说,又信其师黄泽臆撰‘孔子奉君命修国史’之文,不知圣人口授微言,实是私修而非官书。不信古义,而臆造不经,故其所著《集传》《属辞》,仍不免有误也。”^⑧即是说,其史法、经法之辨别仍有未当处,以此释《春秋》,仍不免附会臆说。

但从整体而言,赵汭以“策书之例”与“笔削之义”为核心的《春秋》义例学说,严密完整,自成体系,超越了三传以来诸家义例说,是西晋杜预以来研究《春秋》经传义例最成体系者。赵汭探讨《春秋》义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建构一套严密的《春秋》诠释系统,并以此为依据揭明孔子《春秋》的经世之旨,其代表作《春秋属辞》与《春秋集传》就是体现此理念的良好典范^⑨。正因如此,赵汭不仅建立了完整的《春秋》义例解说系统,而且形成了自己以义例说经的《春秋》学说体系,从而奠

① 宋濂《春秋属辞序》。

② 赵汭《春秋师说》卷下,“论学《春秋》之要”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1988年版。

③ 赵汭《春秋左氏传补注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1988年版。

④ 宋濂《春秋属辞序》。

⑤ 赵汭《东山存稿》卷3《与朱枫林先生允升学正书》。

⑥ 赵汭在其致宋濂等人的书信中也谈到他借鉴吸收各家义例说的情况“第一篇与末篇即是黄先生之意,考之经传,并不见笔削之迹;第二篇笔削之旨,乃本二传、陈氏,择其所当存而补所未备;第三篇至六篇间有先儒之说,而《后传》之指居多,或辨其所未然;第七篇发机于二传、何氏及西畴崔氏。”(赵汭《东山存稿》卷3《春秋纂述大意》)

⑦ 詹烜《东山赵先生访行状》,赵汭《东山存稿》附录。

⑧ 皮锡瑞《经学通论·春秋》,中华书局1995年版,第86-87页。

⑨ 赵汭曾说“《属辞》是先考定史法,以明圣人笔削之权,《集传》是推原事情世变,以达圣人经世之用,二书各有所主,互相发明,而后经意乃备。”(赵汭《东山存稿》卷3《春秋纂述大意》)

定了其在《春秋》学史上的重要地位。尤其是,赵汭的《春秋》义例学所体现出的会通经史、据传求经,由《左传》到《春秋》、由考证史法而辨析经义的治经理路,以及力纠唐宋以来舍传求经、虚辞说经、附会穿凿之弊端的经学理念,更应是其《春秋》义例学说的主要价值和贡献。正如《四库》馆臣所评价:“今观其书,删除繁琐,区以八门,较诸家为有绪。……顾其书淹通贯串,据传求经,多由考证得之,终不似他家之臆说。故附会穿凿不能尽免,而宏纲大旨,则可取者为多。”^①

①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28,“经部·春秋类”。

A Study of Zhao Fang's Theory of "Style of Historical Records" and "Ideology of Modification" in *CHUNQIU*

Li Jian

[Abstract] Zhao Fang was a scholar on *CHUNQIU* at the end of Yuan Dynasty. One of his academic features was paying attention to style of historiography and ideology in Classics. He differentiated betwee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Lu and *CHUNQIU*, between style of historical record and ideology in Classics, then he put forward systematically the theory of ideology and style in *CHUNQIU*, whose kernel was "style of historical records" and "ideology of modification". His theory was an achievement by synthesizing elements of *ZUOZHUAN* and Du Yu's explanatory notes on it, of styles and ideology in *GONGYANGZHUAN*, *ZUOZHUAN* and *GULIANGZHUAN*, taking in the elements in various scholars' theory. He founded a close system, supplied distinctive and systematic annotations for *CHUNQIU*. Zhao Fang's study of *CHUNQIU* integrating Classics and history, and studying Classics by notes, and his study of *CHUNQIU* began with study of *ZUOZHUAN*, his study of ideology of Classics began with study of historiographical styles. Besides that, he tried hard to change the academic tradition that explained Classics without annotation and gave a farfetched interpretation to Classics which passed down from Tang and Song Dynasties. These were the contributions that he made to study of *CHUNQIU*.

[Key words] Zhao Fang style of historical records ideology of modification ideology and style in *CHUNQIU* style of historiography and ideology of Classics

(责任编辑 汪高鑫)